



# 文化语言学论纲

——申小龙语言文化精论

申小龙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

# 文化语言学论纲

——申小龙语言文化精论

申小龙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桂)新登字 05 号

文化语言学论纲

——申小龙语言文化精论

申小龙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22.25 印张 插页 2 549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435-2435-X/H·67 定价:26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献给我的母亲胡蕴青和父亲申二伽



申小龙教授

## 作者简历

申小龙,上海人,1952年9月出生。祖籍浙江杭州。1959年入上海铁路职工子弟第二小学读书,任少先队大队长。1965年考入上海杨浦中学。1969年初毕业赴上海横沙岛插队落户,历任拖拉机手、土记者、会计、中学教师。1978年初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初毕业留校任教。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言文化学会会长、英国《宏观语言学》杂志副主编。已发表论文300篇,出版专著18部。主要著作有:《中国句型文化》、《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20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辨录》、《汉语人文精神论》、《汉字人文精神论》、《中国文化语言学》、《语言的文化阐释》、《中国语文传统的现代意义》、《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当代中国语法学》、《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文化语言学论纲》等。主编《文化的语言视界》、《当代中国语言学论纲》、《新文化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文化语言学》丛书、《大千语言世界》丛书、《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中国语言学大辞典·语言学史卷》等。曾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优秀成果特等奖、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学术著作一等奖、全国语言与文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首届汉字文化学术二等奖、“光明杯”全国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三等奖、第八届中国图书奖。1991年被国务院和国家教委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 自序

文化语言学,是80年代中期在我国兴起的一门新学科,也是我国现代语言学在历经一个世纪的规范科学道路之后,在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种范式变革思潮。这里说的“新形势”,一是现代语言学自身的危机,即旧规范的局限日益突出地暴露出来,导致语言学的停滞与萎缩;二是文化研究热的兴起,人们从我国近、现代文化史的历程和中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现代语言学危机在文化上的根源,并找到了出路之所在;三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一大批青年在10年插队落户后考进大学,又经过10年拼搏,走上了理论学术的讲坛。这一代人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创造着新一代的学术。

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语言学已走过了10个年头。作为这门学科的倡导人,站在10年的时界上,我竟没有时间去回顾走过的历程!因为这门学科正以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国内和国际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引起激烈争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青年语言学者辛勤耕耘,各种集体的和个人的科研、出版项目已将目前乃至今后几年的日程表排满。自80年代末以来,两年一届的全国文化语言学研讨会已先后在大连、广州、哈尔滨三地召开,春城昆明即将召开第四届会议。讨论日益深入,成果日益繁盛。在当代中国语言学里,恐怕没有哪个学科像文化语言学那样硕果累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语言学在我国现代语言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人文科学的本体论、方法论,第一次使用了人文科学的语言。

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导师张世禄先生在我1990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化语言学》中作序指出:“语言与文化,是人类思

想史上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课题。说它古老,是因为人类几乎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思索着自己与语言的不解之缘,并在语言的规范下创造并传承着不朽的文化。说它年轻,是因为在当代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语言的文化功能正受到越来越广泛、深入的关注。语言与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课题。说它古老,是因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教科书——经学典籍的传承与阐释是通过传统语文学——小学进行的,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同中国文化阐释联系在一起。说它年轻,又是因为中国语文研究的这个悠久的‘文化的’传统,在本世纪初以来的现代语言学进程中被抛弃了。其结果一方面使中国的语言研究孤立于社会、文化研究之外,孤芳自赏,顾影自怜,学科日渐萎缩;另一方面使中国的语言研究盲目模仿西方语言学传统,严重曲解了汉语的性质和组织规律。现在,语言与文化的课题由年轻一代语言学者重新提了出来,并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建立起中国文化语言学,这对于中国的语言研究和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正是这种意义使我国年轻一代语言学家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所在并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写下了中国语言学又一个世纪之交的灿烂篇章。

本书是应广西教育出版社副总编李人凡先生的约请,对我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探索的一次理论概括,同时对下一个世纪的文化语言学研究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全书第一章是语言本体论的问题,力图回答作为汉民族文化的符号系统,汉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换句话说,汉语是如何表现它的文化属性的,汉语与汉民族文化的联系是不是一种本质的联系。朱德熙先生曾斩钉截铁地对我说:“语言与文化没有关系!”“你要说二者有关系,你就要证明它。”美国学者屈承熹先生在与我商榷的一篇文章中则认为词汇与文化有密切关系,例如常吃的食物其词汇分类就很仔细,所以汉语有“米、饭、谷、稻”,英语只有一个 rice,而英语有 preserve, jam,



jelly, 汉语只有一个“果酱”。又如常用的动作, 其词汇分类也很仔细, 汉语有“挑、背、抬、提、顶、挽、托、捧、扛、拎、抱……”英语只需一个 carry by/on/with, 因为汉人过去的搬运方式较原始, 而英美人较早使用了机械, 淘汰了那些原始的动词。然而除此之外, 在语言的其他方面要找到确切的文化痕迹, 却不是那么直截了当。吕叔湘先生的观点又温和一些。他说: 我所了解的文化语言学, 是说某一民族的某种文化现象在这个民族的语言里有所表现, 或者倒过来说, 某一民族的语言里有某种现象可以表示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方面。照这样理解的文化语言学当然是语言学的一个方面, 是值得研究的。可是如果说只有这个才是语言学, 别的都不算, 什么语法范畴啊, 句子分析啊, 都不算, 那是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同意的。在这里, 吕叔湘先生把“语法范畴”、“句子分析”放在“文化语言学”之外, 可能是出于与屈承熹先生同样的考虑。事实上, 以往人们谈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多限于词汇层面。早期人种语言学的工作就是一种文化内容中各方面的相对比重给出词汇指数。这种浅层的对应使一些有追求的人类学家断然否认语言与文化的联系, 因为语言的本质在于其结构系统, 语言与文化的本质联系应在于它们内在形式格局的一致性。为这个“结构”难题打开经验视界的是美国人类语言学者沃尔夫。他对美洲印第安霍比语的研究证明: 霍比族的文化和环境塑造了霍比语言的型式, 反过来它们又为霍比语言的型式所塑造, 从而逐渐地形成了霍比的世界观。沃尔夫由此认为, 语言的体系性决定了它对文化发展的内在建构形式具有权威性。作为中国的语言学者, 我不能不感受到“沃尔夫假说”的挑战意义。本书的第一章, 正是我对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结构通约”这一前人视为禁区的领域所作的探索, 由此建立的“文化的”语言观奠定了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本书的第二章是以本体论的语言观为基础, 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规范作文化反思。重点剖析了语法学、理论语言学和文字改

革的研究,从而提出了一个语言学的文化重建的问题。在这一章中我特意提出了“海派语言学”的概念。语言学上的京派海派,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有意思的是,无论“京派”还是“海派”,都对此讳莫如深。然而,对海派语言学的研究在世纪之交的语言学转型期却有重要的意义。上海,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摇篮。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修辞学发凡》,第一次语言学讨论“文法革新讨论”,第一个语言学组织“中国语文学会”,都是上海孕育、诞生的。这同上海的地理人文景观有重要联系。上海地处中国传统文化最发达的东南地区,近代以来又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一个城市,她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由于上海本土文化水平高,人才荟萃,开埠以后又接通海外,得风气之先,因而形成一种创新、开放、杂交、多元的文化氛围——这是海派语言学得以生根、发展的土壤。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海派语言学形成特定的区域性文化特征和特定的时代特征是始于30年代的文法革新讨论。这次讨论反映出海派语言学在积极引进西方语言学思想的同时,从一开始就注意立足中国文化特点,消化吸收西方文化,熔中西文化于一炉。几十年来,海派语言学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具备了一种从容选择的气度,在平静而不急功近利的心态下去寻找中西文化交融的结合点,使传统文化呈现出新的生机和发展方向。这在中国语言学经历科学的“分析的时代”的历史变革中,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超越意识。从文化渊源的角度看,这种意识正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现代文化的民族意识。海派语言学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的兼收并蓄,学术宽容。它从未有过君临一切的霸主意识。相反,它鼓励多样化的探讨,不习惯定于一尊而喜欢不拘一格。因此,海派文化人的自我意识都比较强,学术理论上个性鲜明而又不固执己见。在他们看来,结论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不断突破自己;方法优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不要企图用一种方法排斥十种方法,用一个目的压制十个

目的。因此海派语言学在发展中能始终保持新鲜感、好奇心、创造力和幽默感,敢于突破陈规旧矩,标新立异,开风气之先。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海派语言学具有深厚、鲜明的文化哲学意蕴。海派语言学的大师们对汉语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认识,无不浸润着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博大而精深的理解。这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缺乏文化哲学、汉语精神和民族主体意识的苍白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海派语言学一代代传承的注重理论思维、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道路的传统,在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本书的第三、四两章是对中西语文传统的文化阐释,这种阐释的前提是认定中西语文传统的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这种差异无法纳入以某种异文化为顶点的发展序列以判断其“贤愚优劣”,而只能在充分理解和探究的基础上开展积极的对话。由于中国现代语言学缺乏这样一种“阐释的前提”,它与西方语言学的对话是不成功的。它仅仅是在西方语言学的话语系统中消解中国语言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内涵。正因为如此,对于转型中的当代中国语言学来说,中国语文传统的阐释和重建就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也是文化语言学的一项重要基础理论工作。语文传统阐释的本质是从对传统的现代清理和理解中找到中国语言学的生命之源,并据此规划整个语言和语言学科的结构蓝图,同时为人类对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理解提供新的途径。在进行这一项工作时,对西方语言人文主义理论的借鉴是非常必要的。我国现代语言学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一直拒绝西方的语言人文主义理论,只接纳西方的描写主义、科学主义语言理论。这同样深刻地阻碍了我国语言学形成一种人文科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和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纵观西方的语言人文主义传统,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欧洲的以哲学思辨为特征的语言人文主义,还是美洲的以人类学实践为特征的语言人文主义,都关注语言结构类型的文化特征,关注语言的民族精神,关注语言无与伦比的社会文化功能。他们对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结构、

语言分析的方法等问题的探究,与中国古代以经学阐释为特征的语言人文主义传统有深刻的共识。毫无疑问,只有运用人文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语言,中西语文传统才能理解和对话。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语言学才能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我近年来给语言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的专业外语课中,已经开始系统地讲解西方语言人文主义理论。本书第四章对其中重要的观点及其沿革作了研究和探讨。

本书最后一章讨论了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其中既有宏观的方法论,也有微观的方法示例。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研究方法在语言学各个具体学科领域的扎实而富有创造性的运用。在我最近主编的一套《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中,我和我的朋友们分别撰写了《当代中国文字学》、《当代中国音韵学》、《当代中国训诂学》、《当代中国方言学》等一套 10 种专著,用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方法重建中国语言学的各主要分支学科。其中每一种都涉及大量的语言调查实证。随着研究的深入,具体方法的运用和实证将在我们的工作中占越来越大的比例。这是一种令人快乐的实证。因为它再也不是为旧的科学规范作无穷期的“扫尾”,而是为新一代的信念和蓝图“添砖加瓦”。在本章的最后由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自然引出一个敏感的问题:语言的共性与个性。这个问题是语言人文主义和语言科学主义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回避不了而又不急于下简单结论的问题。语言受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制约,语言的发音又是一种物理现象,人类语言当然有共性、普遍的一面。然而语言又是一种符号化了的“世界观”,一种联系人与世界的根本纽带,一种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媒介和杠杆。因此,人类语言呈现出各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在我们看来,在语言研究中与其循共性的假设不断引入西方语言学的“成说”,在汉语研究中不断地“试错”,不如循个性的假设在本民族文化规律和语文传统的依托下探究汉语的真谛。道理很简单,因为文化是不可通约的。任何引

进的“成说”在它进入汉语的系统时，都不得不对汉语的系统实施“重组”，因而它本质上不是在“发现”汉语的结构，而是在“制造”汉语的结构。这又牵涉到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我们究竟是要感悟“事物的本身”，还是要欣赏精致的理性（知性？）形态？这个问题，只能留给读者在读完本书后去思考了。

回顾15年前恢复高考后，我作为“老三届”中最小的一届知青，从生活了9年的海岛踏入复旦大学，到今天成为复旦大学的教授，我深切地感谢我们所处的这个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感谢在我的前进道路上给予我支持的国内外的导师和朋友们。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妻子韩杨，他们给予我的支持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我对我的五岁的儿子逸如感到由衷的歉意，我不知如何偿还被写作占去的许多本该属于他的父子同乐的时间。

申小龙

1994年3月于上海

# 目 录

自序 .....	( 1 )
<b>第一章 语言的文化视界 .....</b>	<b>( 1 )</b>
第一节 汉语与中国文化 .....	( 1 )
第二节 汉语与中国诗歌 .....	( 39 )
第三节 汉字与中国历史 .....	( 80 )
第四节 汉字与中国思维 .....	( 124 )
第五节 中国语言的文化特征 .....	( 168 )
<b>第二章 语言学的文化反思 .....</b>	<b>( 199 )</b>
第一节 文化断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变迁 .....	( 199 )
第二节 当代中国语法学的文化重建 .....	( 229 )
第三节 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的文化变革 .....	( 251 )
第四节 海派语言学的文化选择 .....	( 264 )
第五节 汉字的人文性与汉字改革的科学性 .....	( 323 )
<b>第三章 中国语文传统的文化阐释 .....</b>	<b>( 344 )</b>
第一节 汉语训诂的释义范型 .....	( 344 )
第二节 汉字形态的文化历程 .....	( 357 )

第三节	汉语语法的阐释框架	( 372 )
第四节	汉语修辞的伦理功能	( 418 )
第五节	汉语语言观的文化内涵	( 457 )
第六节	功能主义:中国语言学与世界的对话基础	( 477 )
<b>第四章</b>	<b>西方语文传统的文化阐释</b>	( 495 )
第一节	从古典洪堡德主义到新洪堡德主义	( 495 )
第二节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及其论争	( 509 )
第三节	系统演变的功能主义解释	( 547 )
第四节	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到结构主义人类学	( 566 )
<b>第五章</b>	<b>语言研究的人文科学方法</b>	( 593 )
第一节	文化语言学方法论思辨	( 593 )
第二节	汉语语法研究的人文科学方法论	( 608 )
第三节	文化认同方法示例	( 622 )
第四节	文化比较方法示例	( 641 )
第五节	传统阐释方法示例	( 658 )
第六节	语言的共性与个性	( 687 )

# 第一章

## 语言的文化视界

### 第一节 汉语与中国文化

**语**言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它比民族的历史要长得多。在一切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中，只有语言和遗传代码是人类从祖先传给后代的两种最基本的信息，但我们今天谈论、研究的语言又无一不是民族的语言。当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在语言、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状态上稳定的共同体出现时，语言就深深地打上了民族的烙印，成为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吸收都要通过语言去实现，因而语言的历史往往同文化的历史相辅而行。质言之，一部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也就是民族语言发展的历史。语言浸透了民族文化的精神；它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民族经济、文化、心理素质各方面的特点。不同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社会发展的不同，文化发展的规律就不同，语言发展的特点也就不同。我们可以说，语言在民族构成的基本要素中是最能全面、深刻体现民族特征的要素。因为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在一定条件下容易变化，而语言作为社会



须臾不可离的交际工具,却是民族诸要素中最稳固的因素。社会在发展中会有突变,语言虽然随社会发展而发展,却不会产生相应的突变,而是稳固发展、缓慢变化的。历史悠久的语言都凝聚着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思想认识、历史文化和民族感情。有了共同的语言,民族的历史、文化、科学才有可能传承和发展。学习一种民族语言,也就是掌握、继承和交流一种民族文化的过程。正因为语言和民族文化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所以研究一种民族文化,离不开对民族语言的研究。反之亦然。语言又是思维的惟一工具。哲学家卡尔纳普说:“一切有意义的哲学问题都属于语法。”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也说:“哲学的目的实际上应该严格地限制为探索经常发生的误解和荒唐理论在语言表达上的根源。”因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也是现代科学面临的一个极其深刻的课题。

在世界语言、文化之林中,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具有十分独特的样态。它们所集中体现的东方汉民族的精神面貌,对于惯于用西方语言和文化来解释世界的西方人是一个尖锐的挑战。近年来,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正成为东西方文化冲突、交融过程中的一项举世瞩目的文化工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化和语言,必将在全新的系统研究中,获得健全的机制、健康的活力和深远的效益。

## 一、汉语与民族思维的互为观照

语言是以特定的民族形式来表达思想的交际工具。人类思维中概念的形成、推理的展开,都需要有语言形式的“包裹”才能巩固下来,人的认识才能推进。各民族思维习惯不同,必然深刻影响与之相应的语言形式。我们常说语法具有民族性,就是因为各民族都有其特有的思维反映现实要素的顺序。在世界各大语言体系中,汉语具有独特的难以为西方民族所理解的面貌。这同汉